

《左传》现当代研究史回顾

王晓鹂*

〔摘要〕 现当代的《左传》研究仍然是从清末持续到 20 世纪初的经今古文之争基础上展开的,而“刘歆伪作说”的论争则是研究的核心问题。民国时期,主要以《左传》真伪问题为中心,并由此延伸到对该书的性质、作者及成书年代等基本问题的讨论。建国前 30 年,随着经学研究的边缘化,学界逐渐展开对《左传》文史之争的讨论,且大多数学者认为其是史书。文革后,《左传》研究的核心由文史之争逐渐转变为经史之争并达到了一个高潮。1980 年代以后,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倾向,一些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等受到学者关注。新世纪以来,学术思想更加多元,研究角度愈发细腻,《左传》文学文化研究亦更趋热闹。

〔关键词〕 《左传》学术史;真伪之争;文史之争;经史之争

《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我国最早以编年体写成的一部讲述春秋时代历史的史学名著。《左传》长于记事,善于修辞,也是一部文学名著。《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又是一部经学著作。因此,《左传》体现出中国古代历史、哲学与文学的高度统一。20 世纪以来,《左传》研究仍然是在清末民初的经今古文之争的基础上展开的,而“刘歆伪作说”的论争则是《左传》研究的核心问题,并支撑起现当代的《左传》研究体系。20 世纪《左传》学研究的最大成绩,就是对“刘歆伪作说”的否定,但是《左传》研究中的经史身份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大多未得到妥善解决,将来仍旧是《左传》研究中无法回避的疑点、难点和焦点问题。而不同时期的《左传》研究,由于历史背景迥异,故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成果上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拟分三个历史时期简要介绍 20 世纪以来的《左传》研究情况,以期为 21 世纪《左传》学的构建提供一些资料和建议。

一、民国时期

《左传》属于古文经,与今文经《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今文经指西汉中期立于学官的,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记录整理而成的《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在今文诸经中,最能反映今文经学学统的是《春秋公羊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不但在政治上通

* 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710062。

过阐发孔子大一统的精义为汉武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汉帝国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在学术上通过吸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建构起一个博大精深的经学思想体系。因此,汉武帝时的儒学独尊,实质上是今文经学独尊,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的独尊。相对而言,用先秦古文“篆书”书写的儒家经书称为古文经,具体指西汉末年刘歆力争所立博士的《古文尚书》、《逸礼》、《左传》和《毛诗》。古文经学在王莽新朝盛极一时,到东汉获得更大发展,尤其是东汉后期,出现了马融、许慎、郑玄等几位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他们深究经义,兼采今文之说,在学术上占有了压倒的优势。后来经过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今文经学几乎丧失殆尽,而古文经学却流传不绝。事隔千年之后,在清末今文经学才重新出现。

经今古文两家的争论从19世纪末就已开始,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崔适。康有为承袭清末龚自珍、魏源和廖平等的观点,作《新学伪经考》,认为刘歆所力争立博士的《古文尚书》、《逸礼》、《左传》、《毛诗》,全都是刘歆伪造的“伪经”,而《左传》更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刘歆作伪的目的是“自立新说以惑天下”,方法是削去《国语》中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又创为书法、日月例,并遍伪群经、增窜《史记》,制造出假的传承谱系以证实其伪。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春秋董氏学序》和《大同书》等文,不但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而且掀起了“今文经学”在经学史上的新高潮。今文经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崔述。崔述于1910年作《史记探源》一书,进一步论证了刘歆伪造《史记》之说。在1918年,他又撰《春秋复始》,抬高《公羊》,认为《左传》与《穀梁》皆出自刘歆伪作。在《左丘明不传〈春秋〉》一文中,崔述又发扬了康有为提出的刘歆分割《国语》而成《左传》的观点,集中辨驳了古文经的传授谱系,以及左丘明受经作传之说。崔述鼎力支持康有为,从而使康氏之说在当时盛行一时。

古文经学的代表是章太炎和刘师培。章太炎是晚清古文经学家俞樾、孙诒让等著名学者的弟子,也是“古文经学”的继承人,这使他不但与《左传》结下不解之缘,而且必须同“今文经学”展开斗争。1891年,章太炎开始“分别今古”,标榜“古文经学”与康有为相抗衡,并最终确立起“六经皆史”的古学宗旨^①。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和《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等著作,都是针对今文经的论说而发。刘师培出身晚清有名的经学世家仪征刘氏,故其《左传》研究继承了家学传统,排杜崇汉,在收集前人旧注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左传》与《左传》学的特点。这无疑抓住了当时今古文经学产生争端的关键。刘师培还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左传》研究的新境界,著作主要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论微》、《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和《读左札记》等,后均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

其实,康有为学说的真正意图是想通过打倒旧的思想体系,以达到维新改革的目的。康有为认为二千多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以“伪经为圣法”的,即王莽朝所立“伪经”的罪过。换言之,他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新莽以后的封建文化与封建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即通过对古文经的怀疑来否定封建意识形态和封建专制制度。因此,康有为对先秦两汉典籍中大量存在的《左传》记载视而不见,这招致岭南学界的领袖人物朱一新的尖锐批评,认为是“合己说者则取之,不合者则伪之”(《与朱一新论学书牋》)。章太炎和刘师培的反击正立足于此,而刘师培的反击更激烈,也更有说服力,其《周季诸子述左传考》、《左学行于西汉考》、《司马迁〈左传〉义例序》、《群经大义相通论》和《春秋三传先后考》等文,运用群经和诸子典籍与《左传》原文相互印证,证明《左传》并非刘歆伪造,是成于先秦的史书,论证有理有据。1919年11月20日,年仅36岁的刘师培

^①参阅刘巍:《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不幸病逝,标志着经今古文之争逐渐落下帷幕。

随着满清帝制的覆灭,封建经学渐趋式微,而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下,西方的新思想大量涌入中国。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掀起了一场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西方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今文学家的疑古辨伪精神相结合,使此期的《左传》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即著名的古史辨派登上历史舞台,代表性事件是1923年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及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等文章的发表。古史辨派继承的还是清末刘逢禄、康有为、崔适等人的观点。倡始者顾颉刚完全肯定了康有为的疑古精神和考证方法,认为《新学伪经考》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古史辨》第一册)。古史辨派的另一重要人物今文经学家钱玄同作《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原名《重印新学伪经考序》),认为“细细繙绎,觉得崔君对于康氏之推崇实不为过。玄同自此也笃信‘古文经刘歆所伪造’之说,认为康、崔两君推翻伪古的著作在考证学上的价值,较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尤远过之”。

1927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发表《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旨在否定康有为等人的“刘歆作伪说”。高本汉用《左传》来比较《书经》、《诗经》、《礼记》、《大戴礼》、《庄子》和《国语》等书,得出在周秦和汉初,没有一种书和《左传》有完全相同的文法组织,而最接近《左传》文法的是《国语》。高氏又用《左传》的文法来比较“前三世纪的标准文言”,最终得出《左传》是前四、五世纪的作品。高本汉关于《左传》真伪及性质的看法,迅速激起学界的广泛讨论。1927年至1937年十年间,围绕《左传》的真伪、作者及成书时间等基本问题,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掀起《左传》和经学研究的新高潮。如:胡适《论〈左传〉之可信及其性质》、卫聚贤《左传之研究》、《季札观乐辩》、《春秋的研究》、《我们的朋友——评林语堂〈左传真伪与上古方音〉》、《读〈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以后》、林语堂《左传真伪与上古方音》、冯沅君《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春秋研究课旨趣书》、《三统说的演变》、钱穆《刘向刘歆父子年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陈景圣《左传之真伪问题》、孙海波《国语真伪考》、卜德《左传与国语》、李审用《春秋左氏传凡例探源》、伍剑禅《春秋左传引诗异同考》、钱玄同《重印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章太炎《与吴承仕论春秋答问作意书》、蒋石渠《春秋左氏传言语学序》、方孝岳《左传略》、唐兰《与顾颉刚先生论〈九丘〉书》、黄侃《书〈春秋左氏传疑义答问〉后》、张西堂《〈左氏春秋考证〉序》、董书业《国语与左传问题后案》、黄萧《珂罗倭伦左传真伪考驳议》、郑师许《左传真相之先决问题》、张其淦《左传礼说自序》、孙之舟《左传国语原非一书证》、孙易《春秋三传授受考》、陆修佑《读左分类选目》、俞平伯《左传遇》、蒋庭曜《春秋左氏传言语绪言》、尚节之《左传国语易象释引言》、杨向奎《论左传“君子曰”》、《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莫非斯《春秋和左传的关系》等。

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左传》本身的真伪。钱玄同赞成康有为和崔适的观点,认为《左传》虽然是真书,但只是《国语》的一部分,且《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来。顾颉刚则沿袭刘逢禄的意见,认为《左传》原是“杂记体之史”,今本《左传》是刘歆改造的结果。这一观点在学界影响很大。卫聚贤认为《左传》和《国语》是完全不同的两本书,《左传》推崇的是“博物家”,《国语》崇尚的是“知礼者”。孙海波与美国汉学家卜德则从不同角度论证《左传》与《国语》是不同的书,而杨向奎则彻底否定了《左传》出于《国语》之说。二是《左传》的成书时间。卫聚贤在《左传真伪考跋》中,认为《左传》成书于周威烈王元年到二十三年之间,即前425年到前403年之间。胡适在《左传真伪考的提要及批评》中,认为“至早当在前四〇三年三晋为诸侯之后,或竟在三八六年田和为诸侯之后”。钱穆等也持战国说。三是《左传》的作者。刘师培、方孝岳等坚持传统说法,认为作者是左丘明。卫聚贤认为是子夏,钱穆认为是吴起(郭沫若后也持同样观点)。四是《左传》的性质。钱玄同、顾颉刚、

童书业都认为《左传》不是《春秋》的传,而黄侃、杨向奎等人则坚持《左传》的确是《春秋》之传。

从上述这些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古史辨派的身影。高本汉原本是要抨击“刘歆作伪说”,但事与愿违,他提出的“《左传》和《国语》文法最近”的观点,无疑为古史辨派提供了口实并被其利用,如莫非斯《春秋和左传的关系》一文,就是利用高本汉的方法,反过来证明《左传》和《国语》原本是一部书。不过,高本汉用语法关系研究《左传》真伪的方法,受到学者的普遍赞赏,如卫聚贤《左传真伪考跋》云:“用这个方法去工作,珂氏算是第一人,我是很赞成的。”这种新颖的研究方法和取得的积极研究成果对西方汉学界影响很大,对我国学者也提供了借鉴。

抗日战争开始后,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由于被日本人列入黑名单而不得不避走大后方。1939年,古史辨派的重要人物钱玄同病逝,这使古史辨派再遭重创,此后古史辨派便逐渐解散,而其倡导的疑古思潮也逐渐回落。此时的《左传》研究,不再集中于《左传》的真伪及性质,而更多的和抗战主题相一致,《春秋》的“尊王”、“攘夷”、“大复仇”等观念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再度得以阐发。1937年,周予同作《春秋与春秋学》一文,首先对各政治势力利用《春秋》学进行反动统治予以学术批评。1939年,由锺泰讲,李敏信记录的《〈春秋〉之国家观与国际观》发表,积极倡导民族主义。1940年,杨树达《“春秋大义述”序》、吴其昌《春秋的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潘重规《春秋公羊疏作者考》等文章发表,用世之义很明显,就是告诫全国人民要努力抗争,并为抗日复国奠定政治伦理基础。1942年4月3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王凌云《左传言礼本于周官经考》、欧阳学《左传研究》、易君左《春秋何以为仁义法》、王焕镛《春秋攘夷说》等文章发表,革故鼎新,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1943年,杨树达《春秋大义述》和李树桐《春秋的大一统主义与复仇主义》先后刊印,继续阐发“春秋大义”,以激励国人抗战之志。蒙文通发表《论国语、家语皆为春秋》,坚持《左传》为割裂《国语》而成。1945年,日本战败。翦伯赞《春秋之义》、木强《读春秋公羊传》、《读春秋穀梁传》、《读春秋左传》,张西堂《穀梁春秋考证(附春秋今古文异同表)》等文章发表,实为《春秋》经传在抗战结束的一种学术总结。抗战时期,《左传》研究方面也有具体成果:如1940年王伯祥《春秋左传读本》出版。与梁宽、庄适1934年出版的《〈左传〉选注》(节选原文11节)相比,此书内容较丰富,文史兼顾,通俗易懂,是近代以来较好的一部普及读物,建国后曾屡次再版。1944年,刘节发表《左传国语史记之比较研究》,再度反对《左传》割裂说。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陈务去作《公羊学与专制政治》,针砭时政。1947年,陈盘《左氏春秋义例辨》刊行,断定“刘歆分裂《国语》以成《左传》,殆无可疑者”。叶华发表《左传之编者时代问题》,认为《左传》成于秦火之后,由于忽视了大量先秦文献,故结论难以成立。秦同培《左传精华》在世界书局出版。此书精选《左传》中多则经典战役,注释详尽,翻译流畅。1948年,罗倬汉《左传著作年代试探》发表,认为《左氏》原为《春秋》编年之书,成书于战国之末或秦汉之际,再次否定刘歆“伪作”说。不过,相对于二、三十年代的集中和深度,此时的研究沉寂多了。但是,经过二十余年大讨论,尽管有些问题如《左传》是否为《春秋》之传、《左传》的作者和成书时间等仍待商榷,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刘歆“伪作”说根本不成立。

此外,民国时期从文学角度(散文)研究《左传》的寥寥无几。较早的要数梁启超于1924年发表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左传国语》,认为《左传》记事严谨分明,情节委曲简洁;记言渊懿美茂,生气勃勃,但介绍实在过于简单。1937年,陈柱《中国散文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散文通史,但十分简略,只有十余万字。陈柱认为《左传》文体风格在于体奇而变,此被《史记》继承;《国语》则显得体整而方,此风格被《汉书》继承;而《左传》文体剪裁严密,也绝非如今文经学家所说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1939年,钱基博《中国文学史》铅字排印本刊印,认为《左传》是《春秋》之传无疑,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并对《左传》的文法大加赞赏。1941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

史》由中华书局印行。刘大杰认为《左传》具有“文史结合”的重要特点,而“时代是战国,作者是失名了”。1947年10月29日,吕思勉在《东南日报·文史周刊》发表《马先之〈左氏纂读〉跋》一文。与陈柱相反,吕思勉认为《左传》以矜练为美,《史记》却以疏散取胜,并再次反驳刘歆伪造说。1948年,柳存仁《上古秦汉文学史》出版,认为《左传》“故事概见完整详尽,书写亦极流畅宣达”,并认为《国语》也是左丘明所作。这些论述,大多见于文学史或散文史,虽然对《左传》有讨论,但是过于简略,并未对《左传》作为文学名著的种种特点和杰出成就详加分析,故结论难免不尽人意。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0年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0年是个约数,指的是1949至1977年。这30年,我国在国家建设、外交、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思想诸领域发生了诸多变化,导致这一时期的《左传》研究呈现出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研究主要集中在“十七年”时期。

十七年时期指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即1949至1966年。新中国建立后,首先面临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变革。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是摆在大家面前的迫切问题,也是棘手问题。从1952年至1955年,中共中央连续开展“五反”运动、“新三反”运动、批判“胡风集团”运动和“肃反运动”,试图对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改造。同时,全国对胡适的思想进行全面批判。这意味着胡适倡导的实证主义和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均被逐渐抛弃,对《左传》的科学质疑也就相应弱化,故此时的《左传》研究几乎停滞,唯有的两个成果,一是陈咏《试谈左传的文学价值,并与巴人同志讨论郑庄公的典型形象》(《光明日报》1955年7月31日)和《略说左传创造人物形象的艺术》(《光明日报》1956年12月16日)两文。陈咏把《左传》作为纯文学,将其与小说创作等同,对以前研究者在文学领域中排斥《左传》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并对《左传》的人物描写技巧发表了精到的意见,在建国后的《左传》人物研究史上发生了重要影响,但显然矫枉过正。二是瞿蜕园《左传选译》于1955年在春明出版社出版(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作者分十个单元介绍了《左传》中一些精彩的故事和史实,译文畅达、注释简要,是建国初最早的《左传》选译本。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左传》研究随即略有起色。1956年,朱东润选注《左传选》出版。全书采用纪事本末体的方式,以时间为序,主要介绍郑庄公、诸侯弭兵等历史人物与重大事件,与清代马骥《左传事纬》单纯从历史研究有所不同,但选文只有注释,没有译文,注释以杜预和洪亮吉的观点为主,整体看还是过于简略。1957年,郭沫若发表《述吴起》,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吴起,应该是受到清代学者姚鼐的影响;王玉哲《左传解题》和苏渊雷《左传·国语·左传》两文,则侧重从历史角度研究《左传》。同时,杨公骥《中国文学》出版。作者用一节专门论述《左传》,对《左传》的叙事赞赏不已,并选释《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从文学手法、阶级根性等方面具体分析了郑庄公等历史人物形象,作者囿于阶级立场,论述仍显拘谨。

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先后在全国展开。1959年,尽管苏联撤退专家,但在自力更生的时代热情鼓励下,《左传》研究还是取得一点成绩,即清代皮锡瑞《经学历史》和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先后出版,严修《批判高本汉和胡适对吾我、尔汝的错误论点》和郭维森《左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等文也先后发表。郭维森肯定《左传》对贵族阶级荒淫无耻生活的揭露和人民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注意《左传》的民本思想,观点符合时代和阶级潮流。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严重困难局面。1961年,施璜《左传故事选译》在中华书局出版,主要针对少年儿童,通俗简单。1962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艺八条》。1962年5月9日,《光明日报》刊发徐中舒

《论〈左传〉写作时期和作者》，认为《左传》成书于前375年至前352年之间，作者是子夏的再传弟子。白寿彝发表《论〈左传〉三事》（《光明日报》1962年12月19日），纯粹从历史学角度解读《左传》的叙事。

1963年，全国文艺界批判运动开始，次年开始扩大到学术界。金德健《司马迁所见书考》出版，仍含混地认为《左传》和《国语》是一本书。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出版。韩席筹与陈咏相反，坚持《左传》是史书，但因成稿在1940年，且思想和方法都较为陈旧，招来很多批评，如谢祚《整理古籍不应宣扬封建思想——评左传分国集注》就是其一。徐中舒《左传选》出版。此书是为全国高等院校历史学科编的教材，以纪事本末体为主，以编年史为辅，注释简单，体例简明，并重申《左传》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于修辞的史学著作的观点。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被作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但和中国社科院编《中国文学史》相比，观点更谨慎。此外，胡念贻《论〈左传〉叙事的倾向性》、郭双成《略论〈左传〉关于战争的描写》、谭家健《从郑公看〈左传〉人物描写的一些特点》、曹道衡《论〈左传〉的人物评述和描写》、仲岚《从〈左传〉的分国集注谈重印古书应该整理异体字和改换通假字》、曹荃《读左传随笔二则》和陈仲庚《〈左传〉中的病理心理学思想》等文先后发表。其中，郭双成对《左传》的战争做了综合研究；曹道衡提出《左传》是“史传文学”的观点，显然和陈咏、韩席筹、徐中舒一样，都是对《左传》究竟是史学还是文学的性质之争，可视为古史辨派的余续；胡念贻和陈仲庚之文，则在论题上显得新颖、可贵。

1965年春至1976年10月，属于“文革”时期，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凋零萧瑟，《左传》研究自然没有任何科学成果可言。

综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庸俗社会学思想的蔓延和政治运动的频繁开展，我国传统的经学研究被边缘化，《左传》研究领域也基本上将其视为史书，研究话题大多集中在《左传》的民本思想、爱国主义、战争、语言和人物等方面，有些观点也有意迎合时代。至于译注类，主要是普及读物和高校教材，通俗易懂，学术性相对较弱。显然，此期的《左传》研究还处在低谷时期。

1949年国民党败退时，从大陆带走大批学者。经过短暂的沉寂后，这些赴台学者便成为台湾《左传》研究的领军人物，先后出版一批论著。如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1958），着意考证经今古文的真相，具有辨明古史及阐发学术指向的双重意义；周法高《周秦名字解诂汇释》（1958）与《周秦名字解诂汇释补编》（1964）等著作，对《春秋》经传所见名字一一作了训释；周何《春秋吉礼考辨》（1961），主要考证《春秋》经传有关吉礼的文献；张以仁《论〈国语〉与〈左传〉的关系》（1962），在比较《左传》与《国语》之异同的基础上，断定《左传》、《国语》并非一人一时所作，对经今文派所持《左传》从《国语》割裂而来的观点进行驳斥；戴君仁《春秋辨例》（1964），简明讨论了《春秋》的经学地位、义例、三传名氏称谓等问题；刘正浩《太史公左氏春秋义述》（1962）等，以《左传》为本，旁及《史记》与诸子，证明《左传》是成书于先秦的古籍，并非刘歆伪造；叶政欣《春秋左氏传杜注释例》（1966），通过杜预注来阐发《春秋》经传大义；程发轫《春秋左氏传地名图考》（1967），对古历推算和地理沿革颇有新见；左松超《左传虚字集释》（1969），对《左传》的介词做了考证；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譌异》（1969），历时十年始成，广泛收集近代出土的古器物文字，引用五百余种参考书，对清儒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所载的春秋209个方国的爵、姓、始封、都、存灭，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辨析，并补充纠正了顾氏著作中的错误之处，对研究古史贡献极大。1970年代，陈舜政译有《高本汉左传注释》（1972），重点在训诂与古代语音，对学界了解高本汉和欧洲《左传》学做出了积极贡献；杨向时《左传赋诗引诗考》（1972），较早从文化角度探讨《左传》的赋诗引诗情况；方炫琛《春秋左传刘歆伪作窜乱辨疑》（1979），则再次批驳刘歆伪作说。整体而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左传》研究，仍然是在经今古文之争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同时，台湾继承了清代的朴学传统，重视考据，善

于在经学领域探幽索微,故在《左传》研究方面有新成绩。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30 年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30 年也是约数,指的是 1978 至 2009 年,即新时期 30 年。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预示着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将再一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社会科学的诸学科一样,《左传》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30 年逐渐迎来发展和繁荣期,内容广阔,成就卓著。此期的《左传》研究可分三个阶段:1980 年代、1990 年代和新世纪时期。

(一) 1980 年代

1978 年至 1982 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我国开始实施恢复高考、为知识分子平反、拨乱反正等一系列政策,彻底解开了套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枷锁,使他们重新满怀激情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在这五年间,广大知识分子被压抑多年的创作激情喷涌而出,民国时期培养的学者厚积薄发,涌现出几部极有价值的学术专著,成为《左传》研究的里程碑:一是 1979 年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的《左传正义》的出版。《左传正义》征引广播,内容宏富,分析精当,沟通古今,融汇中外,是我国此期唯一高质量的专著,和当时的许多单篇论文相比,《左传正义》显然更严谨,更有体系,代表《左传》研究史的开始。二是 1980 年童书业遗著《春秋左传研究》的出版。《春秋左传研究》多有真知灼见,获得许多好评,如方诗铭《春秋左传研究》再版校订说明曾说,“童先生以考据的方法研究理论。学界很多人认为《春秋左传考证》以社会发展观念审视古籍,考求春秋这一中国古代社会变化最激烈时期的历史真相”,确实是一部值得阅读的著作。三是 1981 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的出版。此书历时二十余年,是百年来对《左传》经传作校勘、注释并在注释内容和整理体式上都有创新和突破的唯一著作,无疑是《春秋左传》集大成之注本,功德无量。作为《春秋左传注》的姊妹作,沈玉成《左传译文》也先后出版。这两本书相辅相成,对《左传》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五年间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即 1979 年前后,徐仁甫连续发表《左传的成书时代及其作者》(1978)、《左丘明是〈左传〉还是〈国语〉的作者》(1979)、《论刘歆作〈左传〉——与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商榷》(1981)、《再论刘歆作〈左传〉——从〈左传〉的事实和语言研究证明〈左传〉成书在刘向》(1981)等文,再次提出刘歆伪作《左传》的观点(后结集为《左传疏证》,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徐仁甫坚守的还是清末刘逢禄、康有为和崔适等今文学家的立场,其考证也越发细致,结论也更肯定。本来,自古史辨派之后,关于《左传》真伪问题的研究已逐渐沉寂,而徐仁甫 30 年后旧事重提,自然令学界意外。宋敏《左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的商榷》(1979)、洪成玉《左传的作者决不可能是刘歆——与徐仁甫先生商榷》(1979)、杨伯峻《左传成书年代论述》(1979)、赵光贤《左传编纂考》(1980)和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考辨》(1981)等文先后对徐仁甫的观点进行批驳,尤其是胡念贻的《〈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考辨》一文,通过有力的证据,指出徐仁甫的结论是通过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得出来的。经过这次总清算,刘歆伪造《左传》说终于有了明晰的结论。

1983 年至 1989 年,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逐渐深入人心。1988 年 9 月 12 日,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治国思想,使全国逐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中国的学术研究终于走上正轨。1989 年,山东泰安市召开左丘明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二届纪念左丘明学术研讨会,标明大陆《左传》研究全面复苏。

1980年代,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想仍然有一定影响,《左传》研究从五、六十年代的文史之争逐渐演变成经史之争。如李学勤、徐复观、杨向奎等人继承传统看法,认为《左传》是《春秋》之传,杨伯峻、沈玉成、聂石樵诸人,也坚持《左传》完全是为了解释补充《春秋》,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还列出了《左传》释经的几种方式。台湾学者戴君仁等编著《春秋三传研究论文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逐条陈述各派意见。台湾学者张高评《左传导读》,从体例、文法和修辞等文学角度多方面证明《左传》确实是释经之书:“《左传》之书法义例,诚《春秋》之传;据事直书,则《春秋》之法;属辞比事,洵《春秋》之教;显幽阐微,乃《春秋》之旨;劝善惩恶,固《春秋》之训;界严华夷,为《春秋》之诚;正名辩实,是《春秋》之义;传文缓旨,亦《春秋》之趣。”^①同时,另一部分学者则坚持《左传》是史书,除顾颉刚、韩席筹外,尚有吕思勉、赵光贤、胡念贻、张涤云和台湾学者顾立三等人。顾颉刚讲授、刘起釭整理《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巴蜀书社1988)、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赵光贤《左传编纂考》(1980)、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考辨》(1981)与顾立三《左传与国语之比较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大都认为《左传》是独立于《春秋》之外的先秦史书,《左传》中的解经之语则是后人陆续窜入的,而张涤云进一步断定解经之语是刘歆窜入的(《〈左传〉澄源》,1987)。但是,由于缺乏对《春秋》与《左传》等经学根本问题的深入研究,1980年代的《左传》经史之争在学术上暂成持平之势。

同时,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的考证很热烈。杨伯峻和赵光贤根据《左传》的史实和预言等判断《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与1950年代徐中舒的观点相同,如徐中舒推断为公元前375年至公元前351年,杨伯峻推断为公元前430年以后,公元前386年田和为王以前,赵光贤推断为公元前375年至公元前352年之间。但是,少数几个代表性的预言并不能完全使人信服,如王和《论〈左传〉的预言》(1984)一文,就认为《左传》的预言来源不一,根据不验的预言断定成书年代并不可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汉学家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华学艺社1933,1989再版)通过对《左传》所记各年岁星所在之次不是当时实际观象所得,而是根据公元前365年所观测之天象,以此年为标准的元始年而来逆推,推断《左传》成书当在公元前365年之后,颇有说服力。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左氏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通过对《左传》卜筮预言的分析,《左传》当成于秦孝公之前。郑君华《略论〈左传〉成书年代的有关问题》(1984),指出《左传》成书在春秋末年战国之初,即公元前353年至公元前343年之间。陈茂同《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的年代问题》(1984)辨析了先秦典籍对《左传》的征引情况,认为战国及秦汉时,《左传》已经流传于世,当成书于前415年之前。刘起釭《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后记》则推断《左传》成于战国中叶以前,而《左传》的作者可能与魏国及楚国均大有关联(巴蜀书社1988)。台湾学者刘正浩在《周秦诸子述〈左传〉考》(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中,通过考察先秦诸子典籍征引《左传》情况,认为《左传》应成书于前四世纪初期。显然,1980年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左传》成于战国时期。但也有少数人坚持《左传》成于春秋末期,如胡念贻。相同的是,学者们都认为《左传》经过了多次成书,如赵光贤《左传编纂考》说,“作为一部纪事体的史书,成书最迟在前430年后不久;改变为编年体的记事兼解经的书,当在前352年之前”。胡念贻著的《〈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考辨》也说:“《左传》本来是一部叙事较详的史书,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一部私家著作。它在写作过程中当然参考了《鲁春秋》——我们见到的《春秋》。但它并不是为解释《春秋》而作,它独立于《春秋》之外。后来有人陆续窜入了一些解释《春秋》的文字,这些文字虽然有的经过精心弥缝,消灭了痕迹,但有许多却是窜入之迹宛然。……《左传》不是解经的书,解经的文字是后加的。”关于《左传》的作者,在以前的基础上,赵光贤依据《左传》推崇鲁国和孔子的立场,新提出《左

^①参阅张高评:《左传导读》导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

传》作者是鲁国左姓人的观点。侯廷章《〈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1982)和赵淡元《关于〈左传〉的几个问题》(1989),都以“左丘明作《左传》”为前提,一一列举历代持“左丘明说”的观点。在《左传》与《国语》的关系上,台湾学者顾立三《〈左传〉与〈国语〉之比较研究》通过丰富的资料,坚持《左传》并非由《国语》割裂而来的观点(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谭家健《关于〈国语〉的成书时代和作者问题》则从二者的体例、思想等方面入手,认为《国语》的作者不是左丘明,很有可能是三晋史官(1985)。王树民《〈国语〉的作者和编者》却认为《国语》的作者不出于一时一人,应是各国史官所作,其编者是左丘氏(1986)。沈长云《〈国语〉编撰考》认为,《国语》是在战国时流传的各种《事语》基础上编辑成书的,很可能是出于三晋人之手(1987)。霍旭东《〈春秋〉〈左传〉纪事的迄止年代》认为《左传》的记事迄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在最后的记述中涉及到了鲁悼公四年和鲁悼公十五年的历史事实;除附记外,《左传》实际上只记述了春秋时期255年的故事,仅比《春秋》记事多13年。而最后这段史实的记述,与以前的“传”文体例不同,应该是《左传》完成以后的人补记的(1986)。郭天祥在《〈左传〉迄年辨正》(1988)也提出相近论断。至于胡从曾《〈左传〉〈国语〉引谚之变例》(1983)和吴毓清《从〈左传〉、〈国语〉看春秋时期音乐美学思想》(1983)等文,则属于基于《国语》的其他研究。这些探讨虽然没有定论,但无疑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的边缘化后,传统春秋经传研究在1980年代渐有起色,《左传》学术史研究也相继展开,但着眼点只在经传的形成期汉代和集大成期清代及个别大家身上^①,与民国经学遥相呼应^②。

1980年代,《左传》历史研究日渐丰富,既涉及思想、经济、土地、宗法、官制、城市、姓氏、谥号等传统制度问题,又涉及地理、人物、典籍、历法、婚俗等具体历史考证,还涉及巫术、神学、祭祀、占卜、鬼怪等宗教与哲学问题。这些研究,虽然建树尚小,但无疑开风气之先。1973年,帛书《春秋事语》在长沙马王堆出土,受到学者普遍关注。《春秋事语》共16章,可辨识的文字约2000余字,记事多与《左传》相证,但言论则有不同。1974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座谈会上,裘锡圭和唐兰都指出《左传》和《春秋事语》之间有一定关系(《文物》1974年第9期)。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对帛书《春秋事语》的16章逐一做了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徐仁甫《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时代和作者》通过五条证据,坚持《春秋事语》中的史事出自刘歆伪造,还是属于臆断(1978)。郑良树《〈春秋事语〉校释》在《竹简帛书论文集》中的发表(中华书局1982),为研究《左传》等先秦典籍提供了方便。李学勤《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1989)一文,则说明帛书《春秋事语》是从《左传》内容简化而来,以证明《左传》并非刘歆伪造。显然,学者们开始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左传》等先秦典籍。这表明学术研究方法大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

1980年代,《左传》文学研究逐渐发展起来,人物研究首当其冲。何新文《左传的写人艺术》认为《左传》是“用散文写成的史诗”,观点新颖,是同类文章中的佼佼者(1984)。汪道伦《从踵事增华到虚实相生——中国古典小说与史传文学艺术渊源探微》较早论述了中国古典小说与史传文学之间的关系(1985)。张新科《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建立——从〈左传〉到〈史记〉》则以《左传》、《战国策》

^①如张汉东《〈左传〉及其向〈春秋〉学的演变》、徐相霖《试论汉代〈春秋〉“公羊学”与“左氏学”论战的实质》、张舒亚《论汉代〈春秋〉三传的官学之争》、杨博文《杜预和〈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振甫《〈东莱博议〉的议论》、王更生《历代左传学》、晁岳佩《郝氏〈春秋〉两种评介——论郝懿行的〈春秋〉学》、刘雨民《经学与中国文化》等。

^②经学在台湾一直是显学。1983年4月30日,台北师大就召开了第一届经学学术研讨会。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友谊出版社1988),对比分析三传解释经义的得与失,无疑有助于对《春秋》经“微言大义”的正确理解和阐释。宋鼎宗《春秋宋学发微》(文史哲出版社1986),对两宋33个春秋名家逐一进行考述,脉络清楚。此外,尚有李威熊《中国经学发展史论》(1988)、林庆彰主编《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02—1987)》(1989)、叶政欣《汉儒贾逵之春秋左氏学》(1983)和谢秀文《春秋三传考异》(1985)等经学著作。

和《史记》为主要依据,首次探讨了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建立问题(1988)。但从整体来看,人物研究还处在单个的、著名的、正面人物身上,只是一种粗线条的勾勒,缺乏全面和整体研究。同时,由于受到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从1970年代末开始,《左传》文体研究逐渐出现^①。如,吴长庚《〈左传〉与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从内容和形式、人物形象、表现方法三个方面探讨了《左传》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和发展的影响(1982);孙绿怡《〈左传〉中传说的文学特点——兼评“失之诬”说》对《左传》的文学叙事成就大加赞赏(1986);美籍华人王靖宇《左传与传统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采用西方比较文学的观点,将《左传》纳入叙事文研究领域,并与《水浒传》和《红楼梦》相提并论。至于沈玉成《从文学角度看〈左传〉》(1984),则是对《左传》文学性的整体把握。不过,纯粹将《左传》纳入叙事文研究领域,并用叙事文的故事、人物、观察点、语言来分析《左传》,眼光虽然新颖,但是显然无视《左传》本身具有的经史特质,容易误读《左传》。另外,《左传》的赋诗研究零星出现,如夏承焘《“采诗”和“赋诗”》(1981)、邢天寄《春秋时期的赋诗和引诗》(1983)、张汉东《从〈左传〉看孔子删〈诗〉痕迹》(1985)、王扶汉《〈左传〉所记赋诗例发微》(1989)和台湾学者奚敏芳《左传赋诗引诗之研究》(1983)等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些成果,表明《左传》已经逐渐走向文学文化研究的道路。

1980年代,《左传》语言研究开始细化,涉及《左传》的训诂、具体副词和基本语法等方面,而何乐士《从〈左传〉和〈史记〉的比较看〈史记〉的动补式》,侧重比较《左传》和《史记》的语法特点,让人耳目一新。何乐士的另一文《论〈左传〉前八公与后四公的语法差异》(《古汉语研究》创刊号1988),从语法角度证明《左传》“不可能由后人伪造,因为后人不可能伪造出隐含在语言内部的合乎历史规律的发展变化”,有力批驳了刘歆伪造《左传》说,确实另辟蹊径。1994年,作者又撰写《再论〈左传〉前八公与后四公的语法差异——〈左传〉内部语法、语汇特点的比较》,再次重申观点,无疑给后人指出一条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春秋》经传的正确道路。何乐士后将论文结集为《〈左传〉虚词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代表1980年代《左传》语言研究的最高水平。台湾学者程南洲《春秋左传贾逵注与杜预注之比较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2),则从训诂学入手考证贾逵注与杜预注的异同,认为二者各有价值,不可重此轻彼。

1980年代,在《左传》注译本方面,除了杨伯峻和沈玉成的著作外,还有一些较佳者。如冯作民《白话左传》(岳麓书社1988),依鲁国国君纪年顺序编排,译文流畅通俗,是《左传》普及读本。台湾学者李宗侗《春秋左传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则是注译兼释本,注释尽量参照杜预、郑玄等大家注解,译文力求直译,代表台湾《左传》译注的新成果。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中华书局1988)则对了解《春秋左传》中的人名、地名以及事物等大有帮助,也体现出杨伯峻独特的古籍整理方法,即李解民概括的“注文、译文、字典三位一体的古籍整理方法”^②。

(二) 1990年代

19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蒸蒸日上,香港和澳门的相继回归,更让国人信心大增,山东亦举办了四次与《左传》相关的学术活动,即:1990年泰安市鄆城县成立左丘明研究所;1991年泰安市举办“左丘明与‘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9月1日至4日,淄博市张店召开“《春秋》经传国际学术讨论会”;1998年年底,肥城市石横镇支持地方左丘明后裔成立“史圣左丘明故里丘氏宗亲联谊总会”。同时,港台也积极举办相关学术会议,如1994年香港大学举办“第一届《左传》国际学研讨会”;

^①如美国学者 Ronald C. Egan《〈左传〉的叙事》、伊根撰、张端穗译《〈左传〉中的叙事文》、易平《左传中的传记体雏形》、郑君华《〈左传〉:长篇叙事文学的雏形》、戴伟华《〈左传〉“言语”对战国诸子散文的影响》、吴功正《传记散文和古典小说的审美关系》、美国学者 Burton Waston 译作《〈左传〉:中国最古老的叙事史选篇》、曾广开《从〈左传〉看春秋时期的文学观》等。

^②李解民:《注文·译文·词典——杨伯峻古籍整理方法试析》,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0页。

1999年5月8日至9日,台北大学中文系经学研究会与中研院文哲所合办中国经学研究会第一届学术研究会等,从而使《左传》与左丘明研究逐步系统化、制度化。同时,从七、八十年代起,大批先秦文物渐次出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文献缺乏而引起的对古籍常识、真伪等问题的简单错误定性,并给习惯“疑古”的人们极大的思想观念的冲击。1992年,李学勤明确提出“走出疑古时代”,推动新的学风,提倡资料整理与史事融通二者相结合,解释历史、重建历史,此一用意,在世纪之交推演成“回归原典”的学术需求^①。于是,在对待传统经典的问题上,人们由“不能轻信”过渡到“不可轻疑”,故《左传》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左传》是《春秋》之传”、“左丘明作《左传》”等又被重提,并由此推动《左传》研究走向深入。

在《左传》经史之争中,多数学者认为在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左传》非《春秋》之传的前提下,仍坚持这些古已有之的传统说法。因此,《左传》是解经之作的观点渐占上风,并出现了几部著作,如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认为《左传》本为解释《春秋》而创作,采用的是“以事解经”的方式,同时兼具直接解经的内容,解经内容服务于叙事,而《左传》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可与经文完全对应,并通过解释经义或补充史实解释《春秋》大义。这种解释方式不同于《公》、《穀》,而更能体现其史学及文学上的伟大成就,而否认《左传》为《春秋》之传,是西汉末的今文博士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和学术上的成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台湾学者张素卿著的《解经与叙事——〈左传〉经解研究》以“《左传》解释《春秋》”为中心,分别就解释、叙事、经解与正名逐章深入论述,论述了《左传》的解经性质及其叙事在经学解释上的意义,眼光独到,无疑继承了古文经学的衣钵(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8)。赵生群《春秋经传研究》直接针对赵光贤的观点,运用统计法,分别就《左传》“依经立传”、“无经之传”、“有经无传”、“以事解经”、“三传不书之例与无经之传”、“《春秋》大义存乎事实”诸问题细致分析,阐明《左传》实为解经而作这一根本问题,并进一步论证《春秋》与《左传》二者互为表里,不能割裂(1998年博士论文,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路新生著的《驳刘逢禄〈左氏〉不传〈春秋〉说》则从“刘歆伪作说”的源头刘逢禄入手,申明《左传》是《春秋》之传这一主流观点(1998)。不过,还是有一小部分学者直接承袭1980年代赵光贤与胡念贻等人的论点,通过《左传》中很少有直接解经的文字这一事实,坚持《左传》中的解经之语实为后人窜入。如孙绿怡著的《〈左传〉非经之传》认为就是抽出《左传》中的解经之语,《左传》仍然是十分连贯的分年记事史书,是杜预从形式上将《左传》与《春秋》联系在一起(1997)。李小成著的《〈左传〉非〈春秋〉之传》也认为《左传》现在的流行本定非原本,有一个后人增删并杂入的过程,解经之句也是强行加入的,《左传》当为综合各国史料,并加入了其他来源的材料汇编而成(1999)。雷戈《史为一家》则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了《左传》非《春秋》之传(1999)。邬锡非《〈左传〉争议诸说述评》对20世纪以来《左传》争议数家诸说以简表形式列出(1992)。刘示范《〈春秋〉经传国际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1996)又对“《春秋》经传国际学术讨论会”参会各家的经传观点进行了整理。因此,《左传》是否为《春秋》之传,1990年代仍未达到共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者们又将眼光投向《春秋》三传及其文本,试图通过对具体内容、思想及艺术的发掘与整理,来探究经传之间的关系,但收效并不大。在此基础上,逐渐出现《左传》与《国语》、《尚书》、《诗经》、《穆天子传》、《战国策》、《史记》、《说文》等与《左传》同时或稍后出现的典籍的对比研究,并取得一定成绩。但整体看,研究仍局限在人物、语言、文体、战争、外交辞令等文学艺术方面,缺乏史的宏观把握。而对比研究的范围也日渐向后世典籍拓展,如显懋《〈左传〉战争描写对〈三国演义〉的影响》(1992)就是一例。这彰显出《左传》在历史上的较大影响和潜在的文史研究价值。

^①罗军风:《走出疑古时代的〈左传〉学研究——近三十年来〈左传〉研究述评》,《文学前沿》第12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254页。

在《左传》的作者和时间方面,张平轍《〈春秋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认为现在所见的《春秋》原为季孙氏费国史记,季孙氏于战国初期从鲁国分裂并建都于费,依附于费君的曾申以《春秋》为教材,以其讲义为《传》,即为后世流传的《左传》,又驳曾申授自左丘明,故认为《左传》是孔门弟子所作(1990)。桑秋杰《〈左传〉作者及作者姓氏考》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只是经过曾申、吴起等人的增饰附益,从这一意义上说《左传》“成于众手”也是正确的(1995)。牛鸿恩《论〈左传〉的成书年代》对杨伯峻和赵光贤等人所持的战国说做了修订和补充,认为《左传》最晚在公元前360年至前355年之间写成,作者当是左姓吴期(1994)。林语堂《〈左传〉真伪与上古方音》则从语言学的角度,认为《左传》并非鲁语,《左传》有自己一贯的音理系统,其地名、人名所用的通假字自成系统,代表了一种方音的声势,当成书于获麟(前481)后五十年(1992)。至于《左传》的材料来源,王和《〈左传〉的材料来源》认为有二,即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事笔记和流行于战国前的关于春秋史事的传闻(1993)。

历史研究的重点仍然在制度研究,但已经从1980年代的经济、土地、城市等传统制度问题过渡到政治、文化、礼仪、赋税、婚姻、道德等具体制度建设方面。如,潘雨廷《左传与春秋易学》认为《左传》、《国语》记载的筮例仍是《周易》研究者重要的参考资料(1991);叶友琛《就〈左传〉论春秋时期礼的价值取向与共同特征》通过对《左传》引“礼”进行研究,深入探讨春秋时期的价值取向与共同特征(1998);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凭借《左传》中记载的大量丰富材料,对《周礼》在春秋时期的演变进行了研究,多有新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童教英《从〈左传〉看春秋时期非婚生子的身份和地位》则以《左传》的一些记述为主要材料,借以论述春秋时期非婚生子的身份地位及其成因(1998)。此外,还有对地名、人物、姓氏、武器、军事术语、民族历史、注释及《左传》史学史的考辨与研究等,如陈奇猷《也谈“爰田”》利用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并对先秦文献进行考察,认为这种“爰田”与一般的赏田不同,有其特殊的定制,可成一说(1994)。陈建梁《从文献与考古学角度论〈左传〉中的“大屈”》应用最新的考古成果,对《左传·昭公七年》中的“大屈”作出了解释,认为服虔之说实为可取(1995)。这些研究虽然琐碎,但无疑澄清了《左传》本身存在的一些细节问题。

1990年代,《左传》文学文化研究更加热闹。人物研究已逐渐朝着人物形象的整体化和系统化迈进,如郭丹《〈左传〉人物形象系列及其意义》(1991)和白显鹏《论〈左传〉家族人物群像》(1998)等,显然是从系列形象和家族形象入手来分析。台湾学者程发轫《春秋人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统计出春秋时代的世族215个,并对春秋人物做了综述。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将《左传》中描写的众多历史人物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即“‘累积型’人物形象”和“‘闪现型’人物形象”,就非常见地。在西方理论的作用下,美籍华人王靖宇著《中国早期叙事作品的典范——〈左传〉》(1991)在1990年代流行一时。在其影响下,出现曾海龙《论〈左传〉对编年记事的贡献》(1993)、李梦奎《论〈左传〉的长篇叙事文学特征》(1995)和刘立文《论〈左传〉文本的史诗性整合》(1997)、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等论述。不过,将《左传》仅视为小说,弊端不言而喻。同时,《左传》的外交辞令、叙述艺术、俗谚、民谣、寓言、宗教、军事等方面,也有一批论文,但总体看还是显得薄弱,缺乏宏观把握和深入论述。新颖的是,《左传》赋诗研究成了港台地区的研究热点,产生一批专著,如台湾学者张素卿《左传称诗研究》(台湾大学出版1991),以赋诗活动为主题,探讨了春秋时代的诗学风尚,认为赋诗活动重在断章取义,且与政治紧密相联。后又著《叙事与解释——〈左传〉经解研究》(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8)和《清代汉学与左传学——从“古义”到“新疏”的脉络》(台北里仁书局2007)二书,对《左传》的叙事和清代《左传》学进行细致研究,多有新见。台湾学者曾勤良《左传引诗赋诗之诗教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广征博引,逐条论析,资料翔实,考证严密,是台湾在《左传》赋诗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大陆的刘丽文《从〈左传〉看孔子的“〈诗〉可以观”》在文献的基础上,指出《左传》引诗多为《雅》、《颂》及《周南》、《召南》,此外就是《豳

风》以及郑、卫之诗,并分析了原因(1999)。董治安《从〈左传〉、〈国语〉看“诗三百”在春秋时期的流传》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揭示了先秦时期《诗》的流传过程及文化传统和政治因素对用《诗》的影响(1991)。聂言之、鲁洪生《简论春秋赋诗言志》则全面论述了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形式、原则、方法、功用等内容(1995)。显然,港台地区的文学文化建设比大陆更好,也更早从文学文化视角关注《左传》,成绩也更突出。

1990年代,学术史研究渐趋丰盛,并在方孝岳《左传通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和钱锺书《左传正义》(1979)的基础上,产生了几部完整的著作,如沈玉成、刘宁所著《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和台湾学者浦卫忠《春秋三传综合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就是其中的代表。《春秋左传学史稿》采用了史的研究方法,注意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左传》,并始终贯穿着朴学思想,视野广阔,成就突出。但限于时代原因,作者无法获得全面的《左传》学研究资料,忽略了国外和台湾、香港及大陆地区的一些《左传》学研究成果;又由于将《左传》纳入文学和文献的研究范畴,故对《左传》史学等的成果涉及较少,而其一些观点仍值得商榷,如认为“《左传》是解经之说”,但这一观点遭到赵光贤的反驳。刘宁在第十二章曾评论赵光贤的《左传编撰考》,赵光贤却认为误解了自己的观点,详见赵光贤《左传和春秋是什么关系?——评沈玉成著〈春秋左传学史稿〉第十二章》(《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不过,在1990年代初,《春秋左传学史稿》无疑是一部开山之作。浦卫忠对《左传》中的许多疑难问题都进行了研究,颇有创见,如作者认为《左传》的作者与孔门并无关系,也反对“刘歆伪作说”。此外,除了杜预和刘师培等《左传》学史上的大家研究外,一些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宋代,如张卫中《吕祖谦〈左传〉研究论析》(1992)就填补了《左传》宋学研究的空白。马勇《汉代〈春秋〉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是较早对汉代《春秋》学史进行研究的专著,书中对《左传》学的研究也慧眼独具;章权才《两汉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从政治学角度对两汉经学进行阐述;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则将公羊学资源和现代政治理念结合起来。至于何耿镛《经学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虽然对经学史进行了简单勾勒,但是并没有涉及近现代经学,略显遗憾。

1990年代的语言研究,除传统的《左传》介词、副词、名词和语法等的研究外,在经今古文之争的大环境下,学界开始关注被古文经学冷落的现存第一部注本杜预注本,并出现几篇较好的论文,如董莲池《〈左传〉杜注对句法现象的揭示》(1993)、袁丹《〈左传〉杜注所揭示的特殊语法现象类析》(1996)、刘光明《〈左传〉杜注的语法研究》(1998)等,都从语言角度对杜预注疏进行辩证研究,视角新颖。台湾学者郭鹏飞《洪亮吉左传诂勘正》(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则从训诂学和词汇学入手,对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做了疏证。

1990年代的《左传》注译本,虽然没达到1980年代的高度,但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读本,如:王守谦、金秀珍、王凤春译注《左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集原文、注释和译文于一体,参考和借鉴了历代《左传》研究者的著述,而在翻译方面,则参照和吸收了沈玉成《左传译文》的成果。胡志挥英译、陈克炯今译《汉英对照·左传》在翻译过程中,力求逐句直译,语言流畅,且尽可能地参考了古代和现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可泓《左传名句选译》,选取了《左传》中95则名句加以注释,按鲁国国君纪年顺序排列,易于读者阅读。顾宝田、陈福林《左氏春秋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以鲁国12公为顺序,综合运用20世纪来的《左传》译注成果,论述鲁国及主要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举措和变革,力图展现出春秋时期的历史全貌。

(三) 新世纪时期

进入21世纪后,《左传》研究从成果数量和研究队伍上看,都有量的增加。一大批50后、60后学者成了研究的主体,一些70后的年轻学者也锋芒毕露。同时,各种关于《左传》和“左丘明”的学术研

讨会先后展开,如:2000年9月2日至4日,山东肥城市召开了左丘明文化研讨会暨丘氏宗亲寻根认祖大会,并成立了“左丘明文化研究会”。2001年6月10日,广东梅州市嘉应大学召开“先贤左丘明学术研讨会”。2002年9月,海内外丘氏在深圳成立“中华丘氏宗亲联谊总会”和“国际左丘明文化研究会”。2005年11月5日至6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经学研究中心和新加坡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首届中国经学学术研讨会”。2007年8月28日至30日,西北大学文学院与清华大学历史系在西安联合举办“第二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4月19日至20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与中国先秦史学会及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2008《春秋》《左传》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16日至17日,北京语言大学召开“2009年两岸四地《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学术研讨会”。11月7日至10日,清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和厦门总商会共同主办“第三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显然,《左传》研究已经呈现出组织化、系统化、制度化和国际化的特点。

新世纪的学术思想更为多元,学术观点也更趋辩证。在《左传》的基本问题上,学界显得更为谨慎。值得注意的是,经传之争仍然存在,但有些显得直白,如晃天义《〈春秋〉为史学著作说质疑——兼论杜预的“经承旧史”说及其影响》(2002)一文,反对杜预、刘知几、章学诚等人相传的“经承旧史”说,认同今文经学皮锡瑞“孔子作《春秋》”的观点。而有一些则显得隐晦,如对《左传》的称名之争就属此类。《左传》的称名是经今古文之争的核心问题之一,古文经学认为其称“传”,是《春秋》之传,今文经学坚持其名《左氏春秋》,只是一部史书。王红霞《〈左传〉称名略说》、《“春秋”称名管见》认为从《左氏春秋》到《左传》的过程不是孤立的,是整个经学体系建构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是刘歆将《左氏春秋》的名称改为《春秋左氏传》,后世简称为《左传》,而《左传》由“经”到“传”的转变,本是伴随着古文经学兴起而最终形成的(2004)。罗军凤《〈左氏春秋〉的撰作与流传》也认为《左传》“传”之名称的由来,是争立学官的副产品,也是今古文之争中今文学胜利的象征(2008)。姚曼波重提《左传》的作者是孔子的观点,也是针对这一问题而言^①。2001年,姚曼波发表《孔子作〈春秋传〉史实考》,后结集成《春秋考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引起学界对《左传》作者的广泛论争^②。牛鸿恩《厌弃〈春秋〉尊〈左传〉——姚曼波女士〈左传〉“蓝本”作于孔子说驳议》(2002)、《“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实——兼驳“孔子所作〈春秋〉非‘经’而是‘传’说”》(2003)、《先入为主的主观体认——三驳所谓“孔子作〈春秋〉传”》(2006)、黄觉弘《〈左传〉先秦授受世系之由来辨伪》(2002)、《吴起与〈左传〉之关系辨正》(2004)、《“孔子作〈左传〉说”再议》(2005)、《刘歆争立〈左传〉始末略论》(2005)、《〈左传〉成书上下限推考》(2006)等文持反对意见,针锋相对。姚曼波毫不示弱,相继发表《从〈左传〉〈国语〉考孔子“笔削”〈春秋〉义法——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之二》(2001)、《孔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2002)、《再论孔子作〈左传〉蓝本——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2002)、《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史实否定不了——再驳牛鸿恩之“驳议”》(2004)、《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的关系新论》(2006)等文坚决予以反击。期间,张京华《〈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2001)、刘丽文《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关系考论》(2004)、宁登国《〈左传〉记事终止时间辨正》(2006)、任晓锋《由〈左传〉内容看该书作者之歧争》(2006)等文,都有意无意地加入论争,前后持续五年,成为一时热点。同时,丘氏家族清代族谱《〈左传〉精舍志》的发现,为研究左丘明提供了新的线索。张为民、张均林《左丘明姓氏推考》利用这一资料,从古代的姓

^①毛起认为孔子作《春秋》,仅摘录整理自鲁史,而其真正的著作是以史事阐发《春秋》大义的《左传》,而七十子之徒将最初口说相传的传旨形于竹帛,竹帛所著之言原为孔子所述(《春秋总论初稿》,1935)。此后近60年,孔子作《左传》说颇为沉寂。

^②戴维《春秋学史》也持相似观点,认为《左传》是一部以诸国历史纪年文献而汇编的编年史,而作者对历史事件的评论,是通过引“君子曰”、“仲尼曰”或“礼”而实现的。而这些评论,应为《左传》原文,其后的《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中大部分内容是利用史实以达到阐述自己观点的目的(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氏制度入手,推考左丘明一族的姓氏经历了一个初以丘为氏,后以左为氏,再复以丘为氏的过程,左丘明本人处在以左为氏的阶段(2001)。但是《〈左传〉精舍志》的可信度不为世所重,故左丘明的姓氏问题,仍将是学者持续争论的焦点。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黄觉弘发表《〈左传〉成书秦汉说及代有增益说综考》(2006)、《〈左传〉成书战国说综考》(2006)、《〈左传〉成书春秋说综考》(2008)等系列论文,逐一列举各派学者的代表学说,于《左传》研究大有帮助。而在《左传》和《国语》的关系上,语言学家白兆麟《〈国语〉与〈左传〉之假设句对比》将《国语》与《左传》中的假设复句进行比较,得出《国语》将近340句复句,而《左传》共有560余句,假设复句中二者相同部分与相异部分各有特点,其用法与现代用法亦有不同(2000)。刘丽文《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关系考论》认为左丘明确实是《左传》和《国语》的编纂者,只不过作为《左传》原本的《国语》已经失传(2004)。

新世纪以来,《春秋》经传研究持续升温。经过建国前30年的沉寂、隔膜、批判和后20年的反思后,学者们开始以一种历史的眼光重新评判传统经学,使古老经学重新焕发出光彩,并出现一批颇有价值的《春秋》经传研究论著。其中,有对经学史的专门考察,如范文澜《经学史讲演录》、李学勤《重写经学史》、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吴雁南等主编《中国经学史》、彭林主编《经学研究论文选》、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2000)、(美)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刘黎明《〈春秋〉经传研究》(巴蜀书社2008)、晁岳佩《春秋三传要义解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周远斌《儒家伦理与〈春秋〉叙事》(齐鲁书社2008)等。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既对历代《春秋》和《左传》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又对《左传》作者、成书年代、编撰过程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一部完整的《左传》学史汇编本。同时,对断代经学的探究,已经不限于经学繁荣期的汉、唐、宋和清代,开始关注建安、两晋南北朝、元、明等时代,如黄觉弘《〈春秋〉学与建安文士群》(2007)、周国琴《元儒程端学对〈春秋〉三传的辩驳》(2007)、张德建《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2008)和台湾学者沈秋雄《三国两晋南北朝〈春秋左传〉学佚书考》(台北国立编译馆2000)等,积极开拓经学新视野。对著名经学家的评述,也不再限于杜预、吕祖谦、刘逢禄、廖平、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等经学大家,逐渐出现贾谊、庾信、啖赵、刘敞、苏轼、胡安国、洪亮吉、沈钦韩、王闿运等其他人物,并对其经学贡献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可贵的是,对某一地域经学的局部审视开始出现,如姚文造《论徽州学者的〈春秋〉学研究》(2007)、谭锐《四川历代〈春秋〉学略论》(2009)等文,无疑对地域文化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这一时期,出现了全面总结20世纪《左传》研究历程的学术论文,如赵长征《20世纪〈左传〉研究概述》(2000)、梁涛《20世纪以来〈左传〉、〈国语〉成书、作者及性质的讨论》(2005)、周书灿《经学传统下的〈左传〉学研究》(2007)、罗军凤《走出疑古时代的〈左传〉学研究——近三十年来〈左传〉研究述评》(2007)、刘丽文《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左传〉研究综述》(2009)、陶然《近三十年来〈左传〉研究概述》(2010)、肖锋《百年“春秋笔法”研究述评》(2006)、赵庆运《近代〈春秋〉学研究述略》(2007)、台湾学者张素卿《清代汉学与左传学》(台北里仁书局2007)和张高评《台湾近五十年来〈春秋〉经传研究综述》(2004)及《〈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等,都对一定时期内的《左传》学史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新世纪的《左传》历史研究,重点仍在对制度的考释。过常宝《〈左传〉源于史官“传闻”制度考》一文,利用杜注中有关史官记录的礼制材料,提出史官所记简和策的内容分工都由制度明文规定,故认为《左传》材料的记载是史官文化的一部分(2004)。张岩《战国文体渊源考略——兼谈〈国语〉的史料来源和成书情况》,在存世先秦典籍和出土文献的佐证下,分析了《左传》中的讥语、劝谏、赞语、问答等四种文体的内部结构,认为其属于传统“语”体,从语体史料为《左传》研究提供了思路(2004)。陈彦辉《春秋辞令研究》(中华书局2004),从礼乐文化角度对春秋辞令的形态、产生、演变

等问题进行阐释。其他考释,则涉及礼仪、政治、婚姻、法律、外交、土地、历法、卜筮、方士、人物、铭文、《左传》史学地位、史学观念等方面。此外,还有将《左传》和西方历史的比较研究,如赵绪磊《〈左传〉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编年体异同》(2005)和丁太颢《关于〈左传〉与希罗多德〈历史〉的几点比较》(2007)等,显得较为新颖。对《左传》传播学的研究也是时尚话题,有杨钊《论〈左传〉“诗以言志”的传播学思想》(2007)和赵奉蓉《战国诸子对〈左传〉的传播》(2010)等论文。从整体来看,除了制度考释范围的不断拓展外,生态建设、养生理论和廉政建设等与时代生活紧密相连的内容也进入研究视域,出现了王春阳《从〈左传〉“雩礼”看春秋时期的生态变化》(2004)、李雁蓉《〈左传〉中的水旱灾害》(2005)、姜奕轲《从〈左传〉看中医基本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轨迹》(2008)和侯素利《论〈左传〉中的贿赂现象》(2005)等论文,说明新世纪的《左传》研究角度日益细微。

新世纪《左传》的文学文化研究很丰盛,而人物、文体、对比研究则更加突出。人物研究中,除了女性、家族、士人等人物群象外,还出现一些概述性论文,如何新文《关于〈左传〉的人物评论》(2004)、何新文、张群《现当代的〈左传〉人物研究》(2004)和潘万木《历史中的想象与想象中的历史——从〈左传〉到〈世说新语〉的人物评论》(2009)等文,都对《左传》人物研究史做了总结与回顾。方朝晖《春秋左传人物谱》(齐鲁书社 2001)着重分析在《左传》中占有突出地位或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人物 150 多人的特点。郭丹《左传国策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注重从文学角度研究《左传》的艺术成就和人物。何新文《〈左传〉人物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则是对《左传》人物的概论。该书将《左传》的各种人物研究置于春秋时代“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价值和作用的被认识”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研究,体现出作者多年来对左传人物研究的关注和努力。在西方理论的强大影响下,文体学研究成了热点,出现了大批论文,既涉及《左传》的预言叙述模式、卜筮叙述模式、编年体结构叙事、梦叙述、纪事本末体叙述、历史叙事模式、虚饰与史官叙事、童谣类繇辞、经学叙事等叙述模式,也涉及《左传》的叙事者、叙事特点、叙事艺术、叙事价值、叙述策略、叙事方式、叙事视角,还涉及小说、策祝仪式、箴文、盟辞等具体叙述文体,角度多样,内容丰富。至于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程水金《中国早期历史文化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潘万木《左传叙述模式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等论著,大多将《左传》纳入叙事文,其不足学者已经指出^①。

此外,随着新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左传》经史之争逐渐淡化,学者们更倾向于对《左传》的文史价值进行深入发掘,与之时代相近的先秦典籍便成为首选,而《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周易》与《荀子》等便成重点对比对象,出现不少论文。不过,这些研究还是集中在文体学方面,内容较单一,短期内很难有大的突破。至于《左传》与《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的对比,则多是论证《左传》对后世创作的影响。同时,还有《左传》与日本文学的对比,如李俄宪《日本文学的形象和主题与中国题材取舍的关系——以中岛敦〈牛人〉的创作与出典〈左传〉的关系为例》(2008),属于对《左传》海外历史文化影响的研究。对比研究的重点,则在《左传》与《诗经》之间展开,涉及引诗、赋诗、考证、流变、传播等诸多方面。万平在《论〈左传〉“君子曰”之引〈诗〉》中,将“君子曰”引《诗》的目的归结为“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并概括出六种引《诗》方法加以说明(2000)。黄金明《春秋赋诗、言语引诗与孔子〈诗〉论——以礼用为核心的早期诗学观》认为孔子《诗》论以“礼”为核心,与《左传》等赋诗、引诗体现出的《诗》学观念相一致(2000)。杨素萍《试论〈左传〉中的引诗、赋诗及其他》则指出《左传》引诗、赋诗有“断章取义”的特点,并分析了原因(2001)。台湾学者陈致宏著有《语用学与〈左传〉外交辞令》(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 2000),运用语用学理论来阐释赋诗活动及其语境,并

^①罗军凤:《文化和传统在“中国早期叙事文”中的迷失》,《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

把赋诗活动及外交辞令归属为文化、利益、形势、逻辑、情感等多种因素。后又著《语用学与〈左传〉外交赋诗》，将着眼点从诗转到赋。毛振华《〈左传〉赋诗研究百年述评》(2007)，则对百年来的《左传》赋诗研究做出总结与评判。

《左传》文化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涉及宗教、心理、饮食、服饰、音乐、神话传说、历史传闻、中医学、美学、巫官文化、史官文化等各方面，尤其是刘丽文和龚留柱的专著，论述更系统、深入。至于张汉东、邢子民《左丘明与左传》(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黄丽丽《左传新论》(黄山书社 2008)、鲁毅《左传考释》(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和邵炳军《左氏春秋文系年注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等专著，则从不同角度对《左传》做出了一定研究。

新世纪的《左传》语言研究，对比的范围增加了，辩证、训诂的力度加强了，不但出现了对胡志挥《左传》英译本的失误评析、对日本学者《左传会笺》注释的研究和《左传》在西方的译介与研究综述，而且还有对《左传》谓语动词、介词、句法等专门研究，说明《左传》语言研究已经向着更细处耕耘。姚曼波《〈春秋〉考论》从语言学的角度，针对高本汉所持《左传》作者“同鲁国学派没有关系”及“《左传》或许代表一个更古的时期”等观点，指出高本汉“完全忽视了自古以来被公认为是鲁国人所写的《春秋经》，正是这部鲁人所修的鲁史中，‘于’字用得最多”；她分别考察《尚书》、《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于”、“於”二字的应用情况，认为“时代越晚，作品用‘于’的比例越小。所以，归根到底，使用二者的频率，起决定作用的是时间，而不是空间——地域”。单周尧《高本汉〈左传〉作者非鲁人说质疑》认为先秦典籍的真面目难以恢复，根据今传本中的“于”、“於”等虚词分析《左传》的作者和语言等问题，本属徒劳之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高本汉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左传》的方法论意义，有些矫枉过正(2000)。赵惠君《〈左传〉与〈史记·晋世家〉同义介宾结构比较研究》对两书中的 106 组同义语料中介宾结构的分析，指出介词“补”、“于”在汉代已合流，且以用“於”为常，观点新颖(2000)。刘家和尚《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2001)，以清代古文经学对杜预的否定为前提，充分论证杜注的经学价值。方韬《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综述》则对杜预研究进行了综合评价(2010)。

新世纪的《左传》注释疏证类也有新成绩。如吴静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是对清代学者刘文淇一家四世未完成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续作。吴静安继承刘氏文风、体例、书法、义例，而又能博采众长，并能摆脱刘氏著作中所体现出的门户之见的时代局限。通观全书，例精义博，实事求是，精审独到，融会贯通。陈戍国《春秋左传校注》(岳麓书社 2006)，既能指出《左传》引文的原意，还能指出《左传》中人物以及后世注家的误解，又采用《礼经》解说《春秋经》，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人校注的不足。陈世铨译注《左传选译》(凤凰出版集团 2011)共 33 篇，约为原文的五分之一，所选篇目大多是历史大事的记述或有代表性的文学名篇。注释参考前人旧注和今人研究成果，译文尽量忠实于原文，明白流畅。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对历来《春秋》经传的诸多疑难问题均有所阐发，并对《左传》中体现的礼制、文字、天文、地理等方面附以精彩的论述，是近些年来较好的注本之一。

四、小 结

综上，20 世纪以来《左传》研究内容极其丰富，不但在文学、历史、哲学、经学、选注选译等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中国经学史、文学史、史学史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绩。但是，《左传》领域的根本问题仍存在诸多疑点和再研究的可能性：

1. 作者。《左传》的作者是20世纪《左传》研究的重点,学界先后出现“刘歆伪作说”(康有为、崔述、顾颉刚、钱玄同、蒙文通、徐仁甫等)、“左丘明说”(牟润孙、熊十力、徐复观、方孝岳、胡念贻、沈玉成、桑秋杰、侯廷章、日本竹添光鸿等)、“非左丘明说”(高本汉、杨伯峻等)、“孔子说”(毛起、姚曼波、戴维等)、“吴起说”(郭沫若、童书业等)、“子夏说”(钱穆、卫聚贤、徐中舒等)、“鲁国左姓人说”(赵光贤、黄觉弘等)、“孔门弟子所做”(张平轍)等多种不同说法。按照《史记》和《汉书》等的记载,左丘明肯定与《左传》有关,且《左传》成书经历了一个过程,正如姚鼐《左传补注序》所说:“《左氏》之书非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人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吕大圭《春秋或问》也说:“左氏者,意其世为史官,与圣人同时者丘明也。其后为《春秋》作《传》者,丘明之子孙或其门弟子也。”此二人的说法对于理解《左传》的作者,应该颇有启发。因此,在没有确凿证据否定作者不是左丘明之前,将著作权交与左丘明既是明智之举,又是对历史的应有尊重。

2. 成书年代。20世纪以来有“西汉末年说”(康有为、崔述、顾颉刚、钱玄同、蒙文通、徐仁甫等)、“战国中期说”(胡适、卫聚贤、杨伯峻、朱东润、刘起釞、郑君华、陈茂同、赵光贤、牛鸿恩、日本狩野直喜、新城新藏等)、“春秋末年说”(胡念贻等)、“代有增益说”(徐中舒、沈玉成、台湾刘正浩等)等多种观点。随着《左传》研究的不断深化,西汉末年刘歆伪作说已经被完全否定,学者们多倾向于《左传》非一时一人之作,而在战国中期被写定的观点渐成定论。

3. 迄止年代。1980年代,学界就对《左传》的迄止年代问题达成了较一致的结论:即《左传》实际上记述了春秋时期255年的历史,比《春秋》记事多13年,记事始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93),在最后的记述中涉及到了鲁悼公四年(前465)和鲁悼公十五年(前454)的历史事实,但因这两段历史的记载体例与前文“传”不同,认为此二段历史为《左传》完成后的人所补记。

4. 材料来源。《左传》的材料来源十分丰富,现代学者大多认为主要是王室档案和诸国春秋,外加诸子散文、古史传说和上古神话等先秦史事。出自瞽瞍的口述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左传》的内容与表现手法。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如《左传》的古史来源、神话来源与口述历史等问题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5. 与《国语》的关系。《左传》与《国语》关系问题的讨论,是20世纪《左传》与《国语》研究的共同话题,观点大致分为几类:“一书割裂说”(康有为、梁启超、崔适、钱玄同、胡适等)、“内外传说”(张孟伦、尹达之等)以及“各不相干说”(章太炎、高本汉、钱穆、冯沅君、童书业、谭家健、王化钰)等。相比之下,“各不相干说”似乎更有说服力。至于二书的成书年代,目前也没有定论。大体而言,《左传》与《国语》可能是同时或稍晚出现的,《左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语》的史实记载,是其成书时所参考的众多普通史料之一。目前,学界似乎热衷从文学文化角度对二书进行对比研究。或许,从宏观的文史角度积极探寻,可能会有意外收获。

6. 与先秦典籍的关系。为了彻底弄清楚《左传》的来龙去脉,学者们往往选择与之时代相近的先秦典籍进行对比研究,并成为1980年代以来的一个新方向,《周易》、《礼记》、《尚书》、《春秋事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成为首选对象,但研究大多集中在文本与文体方面,成就较为单一。而对比研究的重点,则在《左传》与《诗经》之间展开,涉及引诗、赋诗、考证、流变、传播等诸多方面。显然,研究呈现出不平衡性。因此,为了真正彰显《左传》的文史价值,从整体上均衡挖掘《左传》与先秦典籍,尤其是与“五经”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学界应该面对的一个问题。

7. 与《春秋》的关系。《左传》与《春秋》的关系问题既是《左传》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根本性问题。古文经学认为是《春秋》之传,今文经学却坚持只是一部史书,而从西汉刘歆开始已经争论了两千余年。20世纪以来,这一问题仍然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并支撑起现当代的《左传》研究体系。如康

有为、崔述、钱玄同、顾颉刚、童书业、韩席筹、徐中舒、刘起釭、吕思勉、赵光贤、胡念贻、张涤云、孙绿怡、李小成、雷戈、晁天义与台湾学者顾立三等都认为《左传》只是一部先秦史书，不是《春秋》的传；而黄侃、李学勤、徐复观、杨向奎、杨伯峻、沈玉成、聂石樵、沈玉成、赵生群与台湾学者张高评、张素卿等人则坚持《左传》的确是《春秋》之传。因此，《左传》是否为《春秋》之传，目前仍未达到一个相对统一的共识，而在对《左传》的文本研究没有重大突破之前，这一问题仍会长期引起争论。

总之，由于史料的严重匮乏，《左传》的经史身份等诸多问题仍然是 21 世纪研究的难点与焦点。笔者认为，这一问题要想真正解决应该具备三个前提：一是出土文献与相应研究的大突破；二是综合运用多学科相融合的研究方法，将“疑古”和“信古”辩证地结合起来；三是努力加强对经史的研究力度，从而在材料、观点与方法之间实现飞跃。其中，尤以第三条为要重。《左传》与经史关系极其密切，应该说《左传》研究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史研究的成就。如果一味强调《左传》的文学文化特点，而忽视其经史特质，显然是对《左传》价值的弱化。《左传》兼具经书、史书和文学于一体，而从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而言，文史哲三体本同根同源。因此，在《左传》研究中，经学、史学与文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脱离经学与史学的《左传》研究无疑丧失了应有的根基，只关注文学则会把《左传》学带入狭窄的道路。21 世纪呼唤新的治学方法，呼唤集文史哲于一身的《左传》大家，更呼唤由此而建构起更有学术特色的《左传》学，以此来弘扬民族文化。

(责任编辑:陆 林)

A Review of Studies on *Zuo Zhua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WANG Xiao-juan

Abstract: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Zuo Zhuan* are still a continuation of the disputes arising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in particular of that about whether the book was the pseudonymous work of Liu Xin or no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focus was on the authenticity of *Zuo Zhuan*, and then was extended to the discussion of such basic issues of the book as its genre, authorship and time of production. During the 30 years before the founding of PRC, due to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classics, the academic circle gradually entered into the discussion about whether this Chinese classic was a literary work or a history book and most scholars regarded it as a historical work.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re issue of the study on *Zuo Zhuan* turned into whether it was a Confucian classic or a historical work. After 1980, the research method showed a tendency of “transcending the ancient era” and at the same time some of the excavated documents such as *Mawangdui Chunqiu Shiyu*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academic thoughts have become more diverse, and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more rigorous and thorough.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researches on *Zuo Zhuan* have also become increasingly vigorous.

Key words: academic history of *Zuo Zhuan*; disputes over authenticity; literary-or-historical dispute; Confucian classic-or-historical dispute